

历史的碎影：为什么是焦裕禄？

方提 尹韵公

摘要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了焦裕禄报道的成因，认为河南信阳事件和三年困难时期从一个侧面刺激了穆青一直在寻找一位对党忠诚、爱民如子、道德高尚的好县委书记，而焦裕禄正好满足了穆青所要求的全部条件。穆青的地位和职业，也使他深知焦裕禄的形象完全符合时代的期盼。从一定角度讲，焦裕禄报道实际上隐喻而高明地表达了我党对不宜公开报道事件的一个负责任的历史交代与回答。

关键词

焦裕禄、穆青、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简介

方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2608485787@qq.com。

尹韵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电子邮箱：yinyg@cass.org.cn。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VXK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Fragmented Reflections of History: Why it was Jiao Yulu?

FANG Ti YIN Yung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lluminates the cause of Jiao Yulu's repor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believes that the Xinyang Incident in Henan Province and the Three-year Difficult Period stimulated Mu Qing to look for an outstanding county Party secretary who is loyal to the Party, loves the people, and has high morality. Jiao Yulu was the very person Mu Qing was looking for. Mu Qing's status and profession also provided him with an insight that Jiao Yulu's image fully m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ime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Jiao Yulu's report metaphorically and wisely gave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incident that should not be reported publicly.

Keywords

Jiao Yulu, Mu Qing, the three-year difficult period

Authors

Fang T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2608485787@qq.com.

Yin Yungong is Dean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 research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yinyg@cass.org.cn.

This paper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Major Project “the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in the New Era” (18VXK008).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鲁迅《无声的中国》

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是我党新闻工作成熟经验之一。通过典型人物的重点推送，加上运用高超的报道技巧，可以生动地表达我党一直倡导的工作作风、优良传统和境界胸怀，有力展示我党一贯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形成新的风尚和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为配合和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我们树立和宣传了一批典型人物，这对净化社会风气，鼓舞人们斗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孟泰、王进喜、陈永贵、王杰、欧阳海等等。其中，影响最大最深的，就要数雷锋和焦裕禄了。他们俩人的模范行为和高尚精神，经久不衰，至今传颂。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重温《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经典范文时，依旧层云荡胸，泪珠盈眶，不禁走向历史深处叩问：为什么是焦裕禄？为什么要选择焦裕禄？

第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由擅长典型人物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三人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以下简称“焦文”），于1966年2月7日上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顿时名播宇内，震撼神州。人们马上会想到：三年前的1963年3月15日，我们

推出了伟大的战士——雷锋，毛泽东亲自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批中央高层领导也纷纷题词助推，全国迅即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就人物形象而言，雷锋已经十分饱满，十分完美，几乎挑不出任何哪怕一丝毛病和一毫不足。既然学雷锋的热劲尚未消退，现在又推出焦裕禄，难道雷锋身上有什么弱点，需要焦裕禄的优点来补充和完善吗？在一般人的心中，雷锋可是形象顶格、难以企及的榜样人物啊！

从典型人物宣传的对象选择来看，我党一贯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基本观点，故典型人物通常是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寻找，一般来说，官员不在选择之列，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媒体的主角。然而，这次却强力推出一个“县令”，违反通常惯例，个中原因究竟在哪？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是顺着逻辑下来的：

推出一个县委书记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是县级干部，而不是科级或司局级、省部级干部？这里面有无奥妙？须知，这在当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为典型人物宣传的啊！

以上诸多问题的思考，犹如月光透过密叶上的点点碎影，必须除去厚厚的粉饰，才能察出历史的底细，觅出真正的精神灵魂！

二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穆青，1966年2月7日）

这是“焦文”第一章节的开首语。以如此的笔触描述一个党领导下的县级机关以及干部的沉闷低落状态，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是相当罕见的。跟着下来，又描写了有名的“车站灾情”一幕：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穆青，1966年2月7日）

这样沉重的语感，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同样是相当罕见的；而类似的场景，恐怕只有在当时的内参和内部报告中，才能见到。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焦文”表达的时空维度：时间是三年困难时期；空间则是灾荒特别严重的省份——河南省。

我们知道，1959-1961年包括延续到1962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曾经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教训深刻的重大毁伤，烙下了难以平复的惨痛记忆。在当时那个年代，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的灾情之深重，几乎冲到建国以来的历史峰值；尤其是河南信阳地区的灾情惨烈程度，更是空前未有，闻所未闻。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党中央不了解当时河南和信阳地区的灾情吗？应该说，党中央至少是了解部分情况；不能了解全部情况，恐怕与下面的瞒报、谎报分不开。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6月30日上报中央，说全省城市和农村共有常年性的公共食堂28万多个。每个食堂平均162人，大部分地区食堂的规模是适宜的。报告还列举了食堂的八条优越性和进一步提出办好食堂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毛泽东年谱，2013：99）。

第二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津专列上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谈农业工作，谭震林说：“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同年5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杨蔚屏说：“现在天旱得很厉害，河南八千万亩麦子，有二千万亩五个多月不下雨，五千万亩是三个月不下雨。”（毛泽东年谱，2013：387）5月1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再次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谈到河南的旱情时，吴芝圃说：

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况跟光绪三年连旱3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1942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吃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今年准备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毛泽东年谱，2013：393）。

况，然而，吴芝圃知不知道信阳地区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这个不清楚；或者吴芝圃已经知道了饿死人的情况，但不敢向毛主席汇报，这个也不清楚。

同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阅读了李富春10月24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10月21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纪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后，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毛泽东年谱，2013：469）自此，信阳事件彻底曝光。信阳事件震动和震惊的中央高层，成了惨痛教训的代名词。后来，不少中央高层领导人一提起反面例子，总是拿信阳当靶子。例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1961年2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毛泽东年谱，2013：552）

毛泽东的疾厉批示和雷霆手段，揭开了信阳事件的盖子，促使信阳事件加快了问题解决的步伐。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调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台，信阳辖区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德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等人被宣布逮捕，其余辖区内的县委书记统统被撤换，信阳地区的所有地县委班子被彻底改组（余德鸿，2003）。据说，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上报判为死刑，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张树藩，2006：534）

信阳事件的许多细节不是本文叙述的范畴，我们想要说的是，穆青作为新华社记者，尤其是担任着新华社副社长的高位，他肯定知晓不少情况，下面的信息他获知，上边的动态他也了解；更何况他是河南人，他应当比一般的记者更关注河南的全面和全部的情况。信阳事件的出现，一定使特别爱党护党、热爱人民的穆青格外痛心疾首。一个地区的县委书记群体里，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撤职，一方面表达了党中央整饬河南县吏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县委书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我们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十几万县级干部的手中。古训在前：郡县治，天下安！

1960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信阳地委12月1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结合整风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普遍开展生产自救工作，发放大批救济物资，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以减轻疾病的蔓延，开展多种经营，执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活跃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毛泽东年谱，2013：513）。

毛泽东批示：“发给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毛泽东年谱，2013：512）。隔了一天即1961年1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上，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印发。”毛泽东还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做了修改。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了“一边抓群众生活”；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毛泽东年谱，2013：515）。同年1月6日，彭真在收到毛泽东指示批示及这份报告后，批示郑天翔、陈鹏、冯基平：“此件很好，可发各县委和郊区委，认真研究，作参考。”（彭真年谱，2012：90）从毛泽东年谱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年谱中可以看出，一个地级区域的引爆问题，得到毛泽东和中央高层那么高度重视和多次批示，在全国所有地级区域中都是罕见的。也正因为中央的密切关注，信阳地区出现的问题从此走出了低谷，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

1963年10月1日上午，在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大会上，彭真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困难，已经被战胜了。”（彭真年谱，2012：293）

尽管我们已经战胜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尽管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许多县委书记泄愤出气甚至痛哭流涕，但是，穆青深知，那个年头造成的后遗症可能尚未消除：党的形象在一些地区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大幅下降，一些县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不少群众的工作热情还没有重新燃起，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在低端徘徊等等。依穆青的级别地位，他还应该知道毛泽东1965年6月16日在三线建设汇报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其间强调：“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毛泽东年谱，2013：501）类似这样的讲话，毛泽东也说过多次。

穆青的政治敏感和党国情怀，非常人所能比。他敏感地意识到，一定要写一个好的县委书记，把党的形象挽回来，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找回来，把失去的部分民心补回来。作为新华社记者，找出这样一个典型意义的县委书记，应当是党中央的期待，人民的企盼，更是时代的呼唤！同时，对于那个年头出现的问题，既然不能公开报道，但可以通过一个正面的县委书记形象宣传，折射地反映那个年头的问

题，也算是对历史做出的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记者必须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回答，无论是直面还是曲笔，形式是次要的，回应才是职责所在。多年来，穆青一直在寻找，他想要世人知道，虽然党内出了信阳地区那样几个工作作风霸道、态度恶劣、公权滥用的坏县委书记，但我党也有忠于使命、作风正派、关爱人民的好县委书记。穆青后来说：

我找了多少年，就想找一个典型，真正按照我们共产党的理想、追求、要求做的，那种合格的共产党的典型，终于找到了一个焦裕禄。写这个人，我真是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感情，我不是在写焦裕禄这个人，我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在塑造他，是通过他那些事实，把他挖掘出来，表现出来（张惠芳等，2003：41）。

穆青是1965年12月初到河南采访的，首站是开封，第二站是老家杞县，然后又去了睢县、柘城、宁陵，最后来到了兰考县。经过多日深入群众、深入现场、深入实际的采访，穆青终于锁定了寻找多年未果的典型目标，开初豫东之行的馄饨印象，最后明确了采写指向。焦裕禄的事迹，让穆青悲恸得不能自持，他对同行记者说：“我参加工作28年，从没有这样哭过。这次是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焦裕禄精神太感人了！这是党的宝贵财富。”他还说：“焦裕禄就是一代共产党员的典型！我们一定要把他的事迹原原本本写出来，让人们看看咱们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舍生忘死为群众服务的。”（张惠芳等，2003：35、38）穆青的最后这句话，显然是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对比度的。这就是为什么选择焦裕禄的真正根本原因。

细读“焦文”，你不能不为作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高超本领所折服。焦裕禄的事迹肯定是非常丰富，动人且感人，然而，再丰富再感人，也不可能把它全部堆入一篇通讯，或者即便长篇通讯也不可能把它全部装得下，因此，如何塑造焦裕禄的高大形象，对于记者的功力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能力考验。前面已说过，穆青具有一个普通新华社记者或人民日报记者所无法具有的政治站位优势，他的官阶使他能够上知“天意”，下晓民情，明察秋毫，洞悉全局，从而使他能够娴熟地取舍素材，选择细节，裁剪事迹，确立主题，以此巧妙地抨击历史的暗靶，显露历史的隐喻，揭示历史的碎影，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埋葬历史怨气，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可以说，没有穆青的政治站位高度，就无法赋予“焦文”的圣人般灵魂。

那么，穆青等人笔下的县委书记应该具备怎样的政治素养、工作精神和职务

修养呢？借用焦裕禄事迹，作者强调：一是，“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转变”；二是，“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四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五是，“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县委书记是人民的儿子；六是，“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七是，“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等等。从一定角度讲，焦裕禄事迹及其精神犹如一面强光镜子，照出了类似信阳地区那些不合格县委书记们的丑陋与肮脏，同时也召唤全国2200多个县委书记都应当以焦裕禄为榜样，向焦裕禄看齐。如此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大有希望，大步前行。

比较雷锋事迹，我们发现，雷锋与焦裕禄确实是各有千秋，各呈亮点。雷锋精神更大众化，更适合普通人群，而焦裕禄的学习阶层要求更高，标准更严。不能把学习焦裕禄的要求和标准，不适合地套在一般群众身上；领导干部既要学雷锋，更要学焦裕禄，焦裕禄的境界和格局应该是所有领导干部尤其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标配。譬如，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领导干部高尚境界，则是雷锋这样的普通士兵所无法具备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既需要雷锋精神，更需要焦裕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说，焦裕禄精神对社会的价值、意义和贡献要更大更强。如果说雷锋是所有普通民众的学习榜样，那么焦裕禄则是所有领导干部的供奉楷模。

四

“焦文”能够公开发表，还要感谢另外二位“高官”的大力支持。一是吴冷西，一个是彭真。

穆青后来回忆说：

1966年，有关焦裕禄的报道，应该说是冷西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那时，他既是新华社社长，还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当我们采访回来向他汇报时，他很感动，决定让我先在社内作个报告，然后集中精力把稿子写好，再由人民日报配社论一同发表。稿子出来后，冷西同志曾多次审阅，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但在最后定稿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害，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我们实在难以做主。这时，又是冷西同志带我找到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我们的观点，最后，由彭真同志拍板决定。所以说，在焦裕禄这篇报道产生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倾注了冷西同志的心血，更是在他全力支持下才得以面世（穆青，2003：74）。

吴冷西地位显赫，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知道许多中央内情，见证过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该说，他完全清楚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及其河南信阳事件的情况，他也更加清楚“焦文”回答了怎样的时代问题以及应该怎样回答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吴冷西之所以敢于支持，是因为他知晓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类似信阳事件情况的判断和评论。按着党内办事程序的规矩，吴冷西必须向彭真汇报，因为彭真当时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彭真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彭真也是头脑清醒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同样也清楚那个年代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他支持了吴冷西，这也就等于支持了穆青。彭真、吴冷西当时均是1964年7月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查《彭真年谱》1966年2月7日的记录，它是这样写的：

审定《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学习焦裕禄的通知。通知说：河南省兰考县前任县委书记焦裕禄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表现了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号召全市干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做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彭真年谱，2012：468）。

正是由于吴冷西的睿智支持和彭真的英明拍板，穆青等人的惊天之作才能够面世见天光。倘若没有这两位明智高官的站台，“焦文”即便写得再好再感人，也是出不来的。历史不应忘记吴冷西、彭真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

可能还有一位高官不应该被忘记，这就是接替吴芝圃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其子刘立强曾称：“以刘建勋为首的新河南省委班子先后做出了三个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即支持修建红旗渠、实施‘借地渡荒’政策和树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刘墨，刘立强，2010：75）

毛泽东在当时的兴奋点正好落在处理《二月提纲》等相关问题上，故他对“焦文”发表是何态度，不得而知。虽然他对焦裕禄没有像对雷锋那样题词，但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焦裕禄的后人，这也可视作一种表达支持和认可的态度。

五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党风问题和社会腐败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1990年3月12日，党中央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指出：“如果听

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在这个历史关口，穆青等人又一次写出了长篇宏文《人民呼唤焦裕禄》，于1990年7月9日由新华社播发，如果说，第一次写焦裕禄时，对某些阴暗面还不敢大胆揭露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写焦裕禄时，对社会丑恶现象，则是毫无顾忌地批评和谴责。譬如，文章中尖锐指出一些领导干部“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只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穆青，1990年7月9日）作者还愤怒指责某贫困县一边拿着国家救济款，一边却“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收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穆青，1990年7月9日）无疑地，再写焦裕禄，又一次震动社会，警醒了社会。虽然以往的历史碎影变成如今的胸意直抒，但两写焦裕禄的主题却是惊人相同，都是剑指失职而堕落的县委书记与领导干部们。

没有比较，就没有厉害。一写焦裕禄时，作者描述了本文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车站灾情”；再写焦裕禄时，作者回忆的“车站灾情”与之前已有较大差异：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20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农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穆青，2003：151）。

更加撕心裂肺的场景，很可能更加接近当年的真相。

为了突出主题，有些旁支末叶的细节有时也不得不忍痛砍掉。据悉，当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时，立即宣布为县长张钦礼彻底平反，同时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千多名基层干部平反。作者从未用过这个有价值的细节，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假如用上了这个材料，会扯出一大堆问题，反而冲淡了主题的集中，故而作者只好弃之不用。此外，焦裕禄的前任是谁？做了哪些工作？是调走还是撤职？等等，作者也从未提及，至今仍是谜。须知，信阳事件之前的开封地区，也是出了不少么蛾子的呢，只不过很快被刹住了。

六

至此，历史的碎影，我们已经完全厘清，其中的历史隐喻和历史暗靶，我们也已明了。在数千名县委书记群体中，出了个焦裕禄，这是我党之幸事；而发现焦裕

禄，全赖穆青一双锐利的慧眼，他找到了含金量最高的富矿，并把它淬火精炼、细心打磨，由此竖起了在我党典型人物宣传史上、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最璀璨最夺目的一座伟大丰碑。焦裕禄及其精神是历史给我们的厚报，也是时代给我们的馈赠。我们在以往时光中丢掉的东西，终归会在后来的岁月中重新拾取。

伟大的焦裕禄及其精神，必定出自杰出记者之手。穆青正是我党自己培养的最优秀记者，穆青一生写了数十个典型人物，但最为成功、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焦裕禄。焦裕禄因穆青的报道而名垂青史，而穆青则因焦裕禄的面世而成为无人可敌的一代杰出记者。焦裕禄及其精神的榜样风采，永远是我党值得骄傲的最硬核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犹如一座功力强大的灯塔，一直照耀着我们奋进的道路。

末了，让我们用《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曲曲折折的历史没有磨灭刻在人民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呼唤焦裕禄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涛，在共产党员心中，在人民群众心中，更加激荡不已（穆青，1990年7月9日）。

焦裕禄及其精神将长盛不减衰，长青不改色！

（责任编辑：束开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刘墨，刘立强（2010）。刘建勋：“信阳事件”后的“救灾书记”。《中国新闻周刊》，（27），75。
- 毛泽东年谱（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穆青（1990年7月9日）。人民呼唤焦裕禄。《瞭望周刊》，（28），4-8。
- 穆青（2003）。《穆青散文》。北京：新华出版社。
- 穆青（2003）。《穆青通讯集》。北京：新华出版社。
- 彭真年谱（2012）。《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余德鸿（2003）。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中国农村研究（200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树藩（2006）。忆“信阳事件”。载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524-5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张惠芳等（2013）。《人民记者穆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